

## 对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变动的分析和讨论<sup>①</sup>

吕利丹<sup>1</sup> 段成荣<sup>1</sup> 刘涛<sup>2,3</sup> 靳永爱<sup>1</sup>

(1.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2.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3.北京大学 未来城市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摘要] 在我国人口结构快速转变、户籍制度深入改革的背景下, 对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近年来的变动进行解读并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学术价值。文章从人口平衡公式出发, 在把握影响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重要因素基础上对流动人口的规模变动进行因素分解, 力图从宏观上构造流动人口规模变动的动态模型, 结合近年来的户籍制度改革和流动人口子群体的构成变化讨论当前及未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动趋势。

[关键词] 流动人口; 户籍改革; 新生代流动人口; 城城流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 (2018) 01-0020-10

### 1 流动人口规模发展最新状况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发展和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致可以分为3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 随着《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的发布, 国家放松了对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镇就业生活的限制, 促进了农村劳动力人口的乡城转移,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670万增加至1990年的2135万, 年均增长约7%; 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至2010年的20年, 流动人口规模持续高速增长, 从1990年的2135万增加至2010年的22143万人, 年均增长约12%; 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以来至今相对缓和的时期, 2010-2014年之间流动人口增长速度下降, 年均增长约3%。在2015年流动人口规模发布之前, 各界对2015年流动人口规模仍然持有增长的预期,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流动人口为2.47亿, 比2014年流动人口规模下降了568万; 另外, 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在2015年基础上继续下降了200万人<sup>②</sup>。

[收稿日期] 2017-10-11

①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生命历程视角下的老年迁移流动研究”(16CRK0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吕利丹, 女,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 段成荣,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刘涛 (通讯作者), 男,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助理教授; 靳永爱, 女,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

② 本段涉及的2005年及以前的全国流动人口数据引用于段成荣、杨舸和张斐2008年发表于《人口研究》的论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 详见文后参考文献信息; 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 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2011-2014年、以及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数据来自该年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另一方面，我们考察一些重点城市 2015 年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化，也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发展趋势。例如上海市外来人口 2010、2012 和 2013 年的增量在 25-40 万人之间，然而 2014 年的增量下降至 14 万人，2015 年更是史无前例地出现了负增长，流动人口绝对规模下降了 15 万人。北京市流动人口绝对规模在 2015 年继续保持增加，但其增量近几年来也是一路下降，值得强调的是 2015 年流动人口增量仅为 20 万人，此前 2011-2014 年增量在 35-60 万人之间<sup>③</sup>。

近年来，一些全国性的宏观政策的出台也在引导流动人口返乡。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号召流动人口返乡创业；2016 年国务院发布的另一文件《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讨论到要从根源上减少留守儿童时，同样提到要号召农民工返乡。可以说，近年的政策在着力号召农民工返乡创业。

流动人口规模在近几年的变动是对政策的快速回应还是人口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如果是人口本身的变动导致的，这是否意味着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到历史拐点？对流动人口规模变动本身的回答、以及背后动因的深入探究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的深度调整、城乡人口规模和结构的持续变化和人口流动模式的多元化，我国流动人口的增长趋势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以上问题的回答需要结合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背景，以厘清我国当前流动人口变动的动因，进而对当前及未来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做出判断。

## 2 流动人口规模变动的分解

人口的变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自然变动，另一方面是机械变动。自然变动由生育和死亡因素决定，中国现在已经处于低生育和低死亡水平，短期变动不大，因此人口的自然变动可以比较准确地进行预测。机械变动由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决定，由于人口迁移和流动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包括城乡人口自然变动、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原因，这些因素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很强，因此要对流动人口规模和结构直接做出预测非常困难。鉴于此，现有文献对我国人口机械变动并不直接进行预测，而是另辟新径（王金营、原新，2007）。

现有文献对人口机械变动（即人口的迁移和流动）的预测方法大致可以总结为“间接估计法”：首先假定没有人口转移的情况下，分别对城乡（或各省）人口进行预测；接下来，根据中国过去城镇化的发展轨迹、并结合发达国家经历的城镇化历程，预测未来我国城镇化率的发展；进一步根据未来城镇化、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等条件的设定，预测未来城市、农村或各省人口的实际分布，这样预测出人口的实际分布与之前假定没有发生迁移流动的城乡和地区人口预测结果的差额，就是由人口的机械变动导致的，由此可以反推乡城人口的流动和劳动力转移。胡英（2003）对全国 2000-2010 年乡城人口转移数量的预测、尹文耀等（2004）对浙江省人口的动态预测、以及王金营和原新（2007）等对乡城人口转移的预测皆以此为基本思路展开。

上述简介估计方法综合考虑了人口自然变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方面因素，有助于我们考察流动人口在给定条件下的长期发展趋势。但是这种方法存在局限：第一，该方法属于间接预测，预测

<sup>③</sup> 本段涉及北京和上海市各年份的流动人口根据《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常住人口和户籍常住人口计算得到。

出来的结果是人口迁移流动后的“净效应”，流动人口群体不断有新进入的群体，也有退出的群体，以上方法无法反映这种群体的更替过程，只反映了进入和退出后的“净”结果；第二，我国现在正在实施的户籍制度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可能引发短期流动人口规模的较大波动，上述预测方法难以反映短期的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冲击；第三，我国正在向流动时代转变，未来流动人口的来源将更加多元，新生代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越来越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方法很难将流动人口群体的内部分层考虑进来。总之，间接估计法忽略了流动人口群体动态的变动过程，也忽略了流动人口的内部分层，仅着眼于变动后的净效应，而将变化的过程视为“黑箱”，不利于对流动人口规模变化的动因和过程做更为细致的分析和更为深入的讨论。鉴于此，为了更好地考察流动人口规模内在变动，本文拟对流动人口变动进行结构分解，并尝试基于这种动态视角来对我国当前及未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趋势进行判断。人口的变动是由出生、死亡和迁移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将流动人口看作一个整体，其变动可以由人口变动的公式来表达。

以  $fp_t$  表示年份  $t$  的流动人口规模， $fp_{t+1}$  表示  $t+1$  年的流动人口规模， $\Delta fp_{t+1}$  表示从  $t$  年到  $t+1$  流动人口的增量， $t$  年到  $t+1$  年的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量可以分解为流动人口的自然增长 ( $n_{t+1}$ ) 和机械增长 ( $m_{t+1}$ )，机械增长即是净迁入流动人口，写成如下公式：

$$\Delta fp_{t+1} = fp_{t+1} - fp_t = n_{t+1} + m_{t+1} \quad (1)$$

即流动人口群体的自然增长 ( $n$ ) 等于该群体的出生人口 ( $b$ ) 减去死亡人口 ( $d$ )。即：

$$n_{t+1} = b_{t+1} - d_{t+1} \quad (2)$$

对于全国流动人口群体而言，流动人口的迁出等同于返乡 (以  $om$  表示)，迁入等同于新进入流动的人口 (以  $im$  表示)。因此，流动人口的机械变动可以表示为：

$$m_{t+1} = im_{t+1} - om_{t+1} \quad (3)$$

以上公式表示流动人口的净迁入人口 ( $m$ ) 等于新进入流动的人口 ( $im$ ) 减去返乡人口 ( $om$ )。

新进入的流动人口，即  $im$  包含了两个流动经历完全不同的群体：一是从未流动过的新进入的流动人口，另一个是以前的返乡流动人口再次加入流动队伍。我们以  $im_a$  表示新增的以前没有流动经历的流动人口规模， $im_b$  表示  $t$  年之前已经返乡且在  $t$  年到  $t+1$  年间又加入流动的人口规模，流动人口的净迁入人口可以表达为：

$$m_{t+1} = im_{a,t+1} + im_{b,t+1} - om_{t+1} \quad (4)$$

将式 (2) 和式 (4) 带入式 (1)，写出流动人口变动的人口分解为：

$$\Delta fp_{t+1} = (b_{t+1} - d_{t+1}) + (im_{a,t+1} + im_{b,t+1} - om_{t+1}) \quad (5)$$

随着 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发布，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流动人口中有一部分可以获得居住地户籍，就地转移为新市民，这些新市民的身份就从流动人口转变为了当地户籍人口，从统计口径上来看，这将导致流动人口减少。我们以  $z_{t+1}$  表示在  $t$  年到  $t+1$  年发生户籍转移的流动人口规模， $\Delta fp_{t+1}$  的分解可经过政策调整后为：

$$\Delta fp_{t+1} = (b_{t+1} - d_{t+1}) + (im_{a,t+1} + im_{b,t+1} - om_{t+1}) - z_{t+1} \quad (6)$$

由于人口的迁移流动具有很强的年龄选择性，因此对分年龄 (组) 流动人口变动进行考察对于把握流动人口结构的变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以  $x$  表示流动人口的年龄 (组)，以  $\Delta fp_{x,t+1}$  来表示  $x$  年龄 (组) 流动人口从  $t$  到  $t+1$  年的增量，我们可以得到分年龄 (组) 的流动人口增量模型：

$$\Delta fp_{x,t+1} = (b_{x,t+1} - d_{x,t+1}) + (im_{x,a,t+1} + im_{x,b,t+1} - om_{x,t+1}) - z_{x,t+1} \quad (7)$$

对于流动人口的新迁入人口，即  $im$ ，其中有两个子群体值得重点关注：一是新生代群体；二是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的发展，跟随子女随迁的中老年人口。根据分年龄（组）的流动人口增量，我们可以获得这两个子群体的增量。

我们用  $\Delta fp_{y,t+1}$  表示  $t$  到  $t+1$  年新加入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虽然目前学界对新生代的定义还在争论，为简化分析，我们在这里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界定为 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在此定义下的新生代人群在不同的年份所处的年龄上限是不同的，其上限年龄可以简化表达为： $t+1-1980$ 。那么，在  $t+1$  年，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年龄范围就是： $0 \sim t+1-1980$ 。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增量为：

$$\Delta fp_{y,t+1} = \sum_{x=0}^{x=t+1-1980} \Delta fp_{x,t+1} \quad (8)$$

另外，我们用  $\Delta fp_{o,t+1}$  表示  $t$  到  $t+1$  年新加入的中老年流动人口，对应的年龄界定为 45 岁及以上的人群。那么根据式 (6) 可以得到中老年新增流动人口为：

$$\Delta fp_{o,t+1} = \sum_{x=45}^{x=\infty} \Delta fp_{x,t+1} \quad (9)$$

此外，我们还可以将流动人口分为细分的子群体考察其增量。比如，根据户口可以将增加的流动人口分为新增的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根据民族，可以分为新增的汉族流动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下文中，我们以  $\Delta fp_{u,t+1}$  表示  $t$  年到  $t+1$  年新增的具有城市户籍的流动人口，以  $\Delta fp_{e,t+1}$  表示  $t$  年到  $t+1$  年新增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具体的公式与式 (7) 类似，只是将流动人口群体细分，在此不再赘述。

对于式 (7) 对流动人口变动的结构分解，我们可以用图 1 作为图示。

### 3 对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发展趋势的讨论

根据《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 年年末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为 2.47 亿人，比 2014 年下降了 568 万。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经历 40 多年持续、快速增长之后出现的首次大规模下降！即便在 2010-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也以年均增加 600 万人的速度不断扩大规模，然而到 2015 年，拐点突然出现。这个拐点，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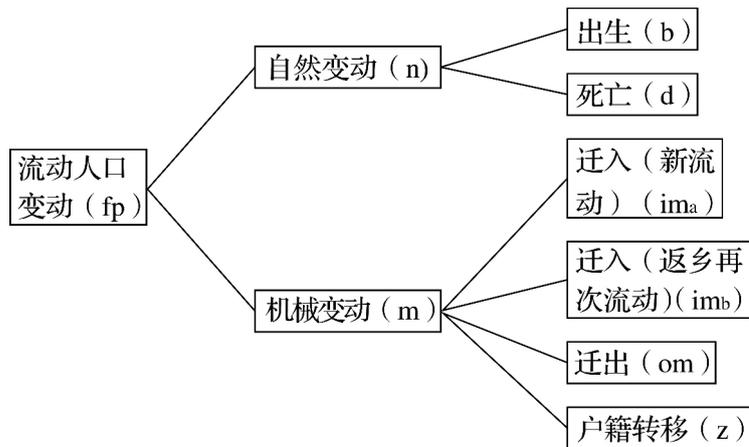


图 1 流动人口变动分解示意图

下面，我们将根据上文推出的流动人口规模变动的分解对流动人口规模变动进行分析和讨论。

无论从人口普查数据还是从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来看，流动女性呈现出低生育水平 (李丁、郭志刚, 2014)，因此自然增长不是流动人口规模变动的主要因素，下文主要围绕机械增长的视角来讨论流动人口变动。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关于 2015 年甚至 2014—2015 年的流动人

口各项相关信息均难以掌握,我们力图根据现有的零星数据来构建流动人口全景图,构建出来的全景图画是否能真实反映现实情况,有待更多、更系统完整的数据加以验证。

### 3.1 临时性返乡加剧

流动人口返乡是近年来是学界和政府都非常关注的现象和问题。实际上究竟有多少农民工已经发生了返乡?还有多少农民工即将返乡?现有文献还没有给出很有说服力的证据,下文我们将根据近两年的调查和公报数据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首先,根据农民工监测数据考察农民工规模的变化可以从“流出地”角度分析流动人口返乡存在的可能性。从2009年我国经济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恢复以来,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规模都在增加,但增幅在不断地减小。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观察2015年农民工的增幅,发现本地农民工的增幅与2014年基本持平,而外出农民工的增幅却明显降低(见图2);另外看绝对规模的变化,全国农民工2015年比2014年增加了352万,其中外出农民工增量仅63万,仅占全国农民工增量的18%。这表明极有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外出农民工返乡成为本地农民工,进而推动了本地农民工比例的增加。

从宏观经济来看,2015年外地农民工增幅减少、本地农民工大规模增加,可能是受到短期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sup>④</sup>,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从业的比例大约为57%,其中制造业约31%、建筑业约22%。在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制造业和建筑行业的产值近年来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15年则是更为戏剧性的一年,我们考察近五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统计资料,发现出现了连续的下降,尤其是2015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跳跃式下降。与此同时,房地产去库存成为的我国2015年经济的关键词,楼市库存成为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影响到相关产业从业人员的就业。以上或许是2015年流动人口规模短期减少的重要经济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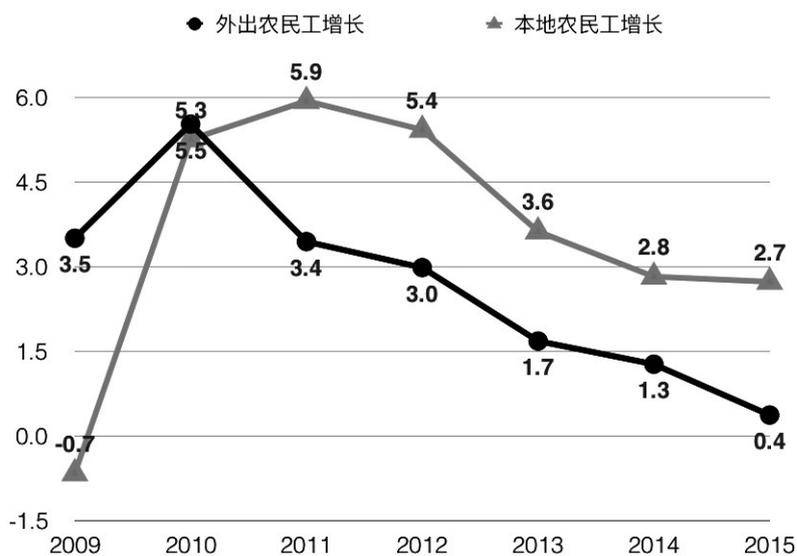


图2 我国农民工增长率(%), 2009-2015

数据来源: 2009-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以上是对农民工返乡的间接估计。根据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监测项目在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等十省流出地调查,15~59岁常住户籍人口中14%有过外出务工经历<sup>⑤</sup>。那么,这些有过外出经历返乡的人口将会在家乡稳定居住还是会

<sup>④</sup>详见: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

<sup>⑤</sup>外出务工经历的界定为跨区县外出1个月以上。

再次外出?我们可以考察他们返乡的主要原因:第一,因为年龄太大、健康不好、没有技能等原因占11%,这部分人力资本处于劣势的人再次外出的可能性不大,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返乡人口;第二,表示外地就业形势不好、本地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返乡创业等原因占27%,这部分以就业驱动的人口其不确定性较大,一旦外面有更好的机会,他们很有可能再次外出;第三,因为家庭原因(照顾老人、小孩、结婚生育等)所占的比例最大(43%),这部分人的不确定性也较大,如果老人、小孩的照料得到了妥善安置,是有可能再次外出的。因此,总的来看,返乡流动人口中四分之一以就业驱动,近一半因为家庭驱动,在家庭问题得以解决、或外地有更好的工作机会的情况下,再次外出的可能性较大。

实际上,根据流动人口对未来居住地的打算也可以推测短期内大规模的返乡并不会发生。以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为例,对近20万流动人口未来的居住安排来看,超过一半(57.3%)的人明确表示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超过5年及以上);近三分之一(30%)的人表示不确定,实际上,这部分不确定的人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会在流入地长期居住;仅有12.8%的人明确表示不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住。

笔者所在课题组在东莞、深圳等地的实地调查也发现,很多流动人口,即使暂时没有很好机会,也选择留在城市。几年前金融危机期间,课题组成员发现在宁波的贵州流动人口与宁波老板之间共度时艰的安排。当然,“共度时艰”的前提是“暂时”,如果持续时间太长,情况则可能发生根本逆转。因此,这方面情况到底向何种方向发展,取决于后续发展情况。

综上,我们认为,2015年可能出现了农民工返乡增加的情况,但这只是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临时性影响,而且返乡农民工并不意味着返回村庄,而更有可能在附近的城镇从事非农工作。迄今,返乡尚未成为一种现实的选项,对流动人口的规模变动不会产生重要影响。未来数年,这方面因素应该还不会成为引致流动人口大规模减少的动因。

### 3.2 流动人口户籍转移增多

2014年07月2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了要“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这意味着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截止到2015年9月份,全国有24个省市出台了户籍改革的具体实施意见<sup>⑥</sup>;到2016年2月底,出台具体实施意见的省份数量进一步增加到27个<sup>⑦</sup>。例如,陕西省提出到2020年实现1000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sup>⑧</sup>,广东省提出到2020年解决1300万流动人口入户<sup>⑨</sup>。

<sup>⑥</sup>详见新华网报道:[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5-09/22/c\\_128253342.htm](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5-09/22/c_128253342.htm)

<sup>⑦</sup>详见人民网报道:<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225/c1001-28149852.html>

<sup>⑧</sup>详见《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网址:<http://www.shaanxi.gov.cn/0/103/10884.htm>

<sup>⑨</sup>详见《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及相关报道:<http://news.sina.com.cn/c/2015-07-07/130732081688.shtml>。这1300万包括省内流动人口600万和省外流动人口700万。对于600万省内流动人口转移,计划从2014年至2020年7年间,每年需吸纳约85.7万人:一是省内农转非,人口约15.5万;二是城市扩容,人口约60万;三是每年的放宽小城镇人口的转移,每年新转移农业人口约10万人(包括新进入城镇就业人口和亲属投靠人口)。对于700万外来人口,将以每年100万的速度解决入户。据统计,广东现有流动人口3495万人,其中来自省外2433万人(就业的约2200万人),居住时间已满5年以上的395万人,半年到5年的1368万人,并将在2020年前陆续达到居住满5年的条件。

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对于流动人口的户籍转移的推动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在控制总体规模的情况下，开始陆续推出积分落户政策；第二，除主要省会城市以外的市辖区落户条件放宽，这主要针对有稳定职业和住所、并持续缴纳社会保险的就业人员及其家属；第三，完全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的落户限制。

目前虽然缺乏全国整体的数据，但是根据个别城市公布的数据，已经说明有不少流动人口及其家属成为了居住地的新市民。例如在成都，2010-2012年的净迁入人口一直在9-10万人之间，2013年该数据上升至11.5万，2014年一跃上升至17.2万。又如在珠三角地区，2013年和2014年非户籍人口都出现了下降，但是迁入人口均保持在50-60万人之间，这些迁入人口极有可能是由流动人口转化而来。整体判断，2015年的流动人口数量减少，应该有一部分来源于该“转移”。具体转移多少，有待更新的各地区户籍人口数据的印证。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实现了“转移”，此类流动人口从身份上已经从流动人口中剥离出去，不再属于流动人口。但是，流动人口在诸多方面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他们其实短期内是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过去数十年内的被征地农民以及通过各种方式“购买”城镇户口人员的情况，与此有较大相似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考虑未来的流动人口问题，一方面需要关注统计数字的变化，但又不能拘泥于数字的变化。对于业已实现或者即将实现“转移”的数千万甚至1亿以上人员，尚需持续予以关注。

### 3.3 新生代流动人口供给短期减少

从劳动力供给的大背景来看，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从供给层面影响了流动人口的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首次下降，从2012至2015年下降的规模分别为345万、244万、371万和487万，从2013年以来下降规模在递增。在此背景下，流动人口近年来的增量也在不断地下降。

新生代劳动年龄人口对于流动人口的供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近年来，流动人口的内部结构已经悄然发生根本性转变，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占流动人口的大部分，更是占新增流动人口的绝大部分。全国年轻人口的队列规模变化，会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流动人口规模特别是其变动方向。换言之，年轻队列的人口规模变动，直接决定着流动人口的年度增量。

根据历年的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我们可以考察新生代流动人口首次外出的年龄：三分之二的人首次迁移时的年龄在15~25岁之间，尤其是16~20岁之间首次外出最为集中。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汇总数据，流动人口的年龄分布从15岁开始出现年龄堆积，在16岁和17岁堆积程度加剧。从0~17岁流动儿童的年龄结构来看，0~15岁的各个单岁组的流动儿童占有所有流动儿童的比例不到6%，15岁流动儿童占有所有流动儿童的比例达到6.9%，16岁和17岁相应比例更是高达10.4%14.3%。可见，当前青少年人口基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供给。

然而，对全国青少年人口规模进行考察，我们发现近年15~22岁青年人口出现了急剧的下降。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推移计算2015年15~22岁青年人口的规模（不考虑死亡因素的影响），发现15~17岁年龄人口比18~20岁减少了535万人（见图3）。为了进一步检验普查数据的可靠性，我们还利用公安部分年龄的户籍人口数据进行年龄推移计算。公安部数据推算结果显示，20、21和22岁的人口规模比普查数据推算的结果稍低，16~19岁比普查数据推算结果稍高，即便

如此，15~17岁人口比18~20岁仍然少了522万人。

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供给主要来自于农村人口，我们利用公安系统农村户籍人口数据进一步考察农村青少年队列的人口变动（见图4）。2015年，15~22岁农村户籍人口规模岁队列呈下降的趋势，农村户籍15~17岁比18~20岁人口减少了272万人，17~19岁比20~22岁人口减少了314万人。不过，从更低年龄的儿童人口队列规模变化来看，从11岁开始，更低年龄段儿童的规模将会回升。

由此可见，全国年轻队列在数量上的暂时减少，是影响2015年流动人口规模变动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在未来几年可能将继续产生影响。但是，随着第四次出生高峰及由此带来的出生队列规模回升，几年之后，这一影响将平稳度过。

### 3.4 流动人口子群体供给的增加

在上世纪90年代，直至2005年以前，流动人口均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中老年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稳定地保持在3~4%的比例（段成荣等，2008）。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在劳动年龄人口老化的大背景下，新进入的流动人口群体中，中老年人越来越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根据2012~2015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在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中，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口比例在逐年增加：2012年为12.7%，2013年为13%，2014年为14.4%，2015年有比较大的提升，达到18.1%。与此同时，我们考察2013、2014和2015年新增劳动年龄的流动人口中45~59岁人口所占比例也在持续上升，依次为6.5%、8.4%和10.7%（见下图5）。促使中老年流动人口供给加剧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新进入的以就业驱动的中年流动人口增多；另一方面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趋势，跟随中青年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中老年人口会增多。而对于2015年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的大幅上升，可能还与中青年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受经济周期影响临时大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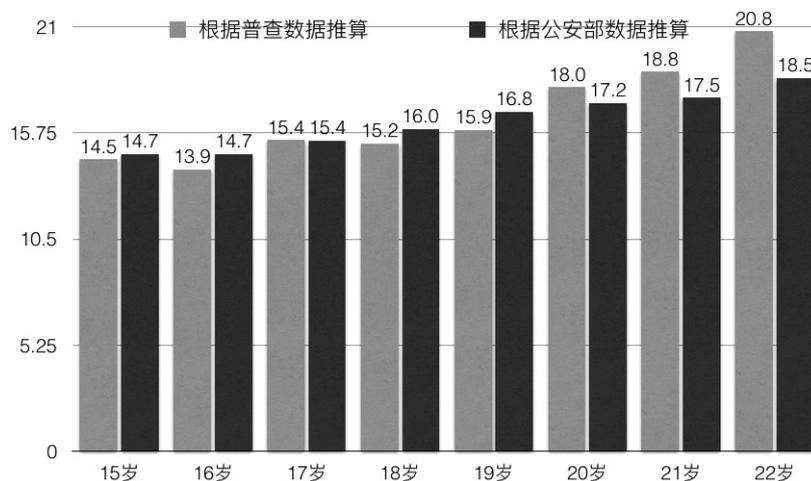


图3 2015年15~22岁单岁组人口规模 (单位: 百万人)

数据来源: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汇总资料和公安部分年龄户籍人口数据推移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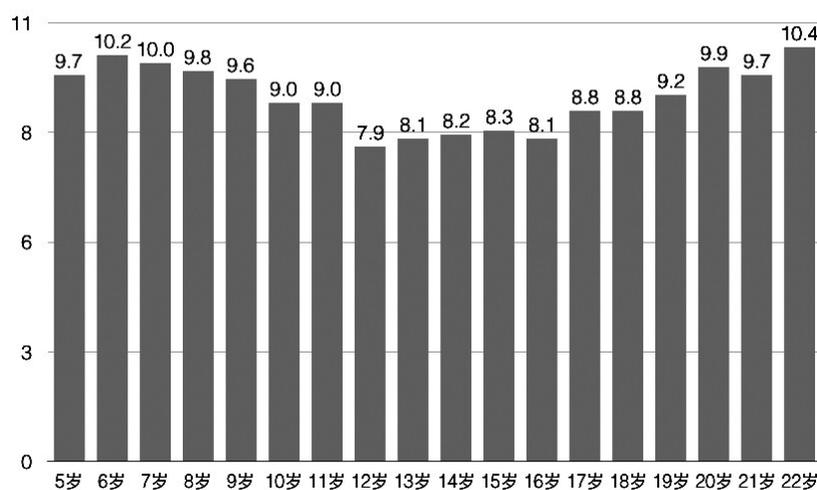


图4 2015年5~22岁农村户籍人口规模 (单位: 百万人)

数据来源: 根据公安部户籍人口推移计算

返乡有关系。

长期以来，对流动人口问题的关注聚焦在以农民工为主的乡城流动人口。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户籍人口加入流动，对城城流动人口的关注越来越多。根据近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结果来看，新增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具有城市户籍的比例有上升的趋势（见下图5）：2013年新增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非农户口的比例为9.5%，2014年上升至10.1%，2015年继续增加到10.8%。

随着户籍改革的推动，一部分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可能会向中小城镇落户转化为新市民，而中小城镇就业机会较少，新市民仍然有可能向大中城市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会有部分乡城流动人口转化为从中小城镇向大中城镇流动的城城流动人口。因此，受户籍改革影响，城城流动人口的比例会继续上升。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空间流动性均慢于汉族，以省内跨县或跨乡流动为主。但近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加速发展的

趋势，流动原因逐渐从社会性原因为主转为经济性原因为主，长距离流动也越来越多，年均增长快于汉族人口。根从2005年到2010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从978万增加至1523万，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率从7.9%增加值13.6%。从近年来流动人口监测调查结果看，第一次参与流动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少数民族的比例在上升，2013年为8.4%，2014年为9.5%，2015年为10.3%。可以预见，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西部发大开发战略、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少数民族流动参与将越来越深入。

尽管目前返乡人口在规模上并不多，但他们对未来流动人口变化的影响可能更大。研究表明，流动人口有明显的“累积效应”，曾经的流动人口，未来再次流动的可能明显更高。根据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监测调查项目2014年“流出地调查”的分析，已经“稳定地”返回村庄的流动人口中，22.4%表示近期会再次参与流动。

从历史的经验看，农民工返乡有可能是当时经济形势相对不乐观引发的暂时现象。已有的经验研究表明，回流的农民工比从未外出过的人更倾向于再次外出流动（白南生和何宇鹏，2002；石智雷和杨云彦，2009）。例如，2008年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大约9%左右的外出务工人员提前返乡（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09），导致本地农民工增加。随着2009年经济的复苏，大量本地农民工重新开始外出，根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当年本地农民工比2008年减少了56万，外出农民工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比2008年增加近500万人（见图3）。与2008年类似，2015年出现的农民工回流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临时性的，如果经济发展方向向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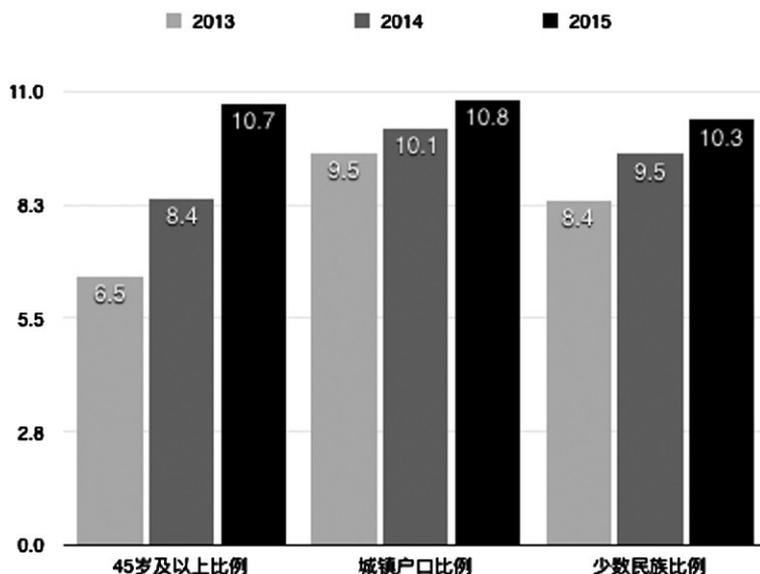


图5 新增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年龄、户口和民族构成，2013~2015年  
数据来源：2013、2014和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

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临时返乡农民工，而一旦经济形势好转，有合适的就业机会，未来仍然可能有一批本地农民工会转化为外出农民工。

#### 四、总结

本文通过分解影响流动人口规模变动的主要因素，构建了流动人口动态增量模型，据此考察流动人口规模在 2015 年临时下降的原因，并判断未来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动趋势。综合上文的分析，本文认为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变动，特别是 2015 年 568 万人的减少，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地看每个因素的作用机制特别是作用程度，尚有待进一步数据资料的支撑，和更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但是，暂时还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我国流动人口到了从增加到减少的历史“拐点”，短期的减少和长期的稳定甚至增加，应是一致的趋势。

#### [参 考 文 献]

- [1] 白南生,何宇鹏. 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2 ( 3 ) .
- [2] 段成荣,杨舸,张斐,卢雪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J]. 人口研究,2008 ( 6 ) .
- [3] 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提前返乡流动人口调查报告[J]. 人口研究,2009 ( 2 ) .
- [4] 胡英.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数量分析[J]. 统计研究,2003 ( 7 ) .
- [5] 李丁,郭志刚. 中国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2014 ( 3 ) .
- [6] 石智雷,杨云彦. 金融危机影响下女性农民工回流分析——基于对湖北省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2009 ( 9 ) .
- [7] 王金营,原新. 分城乡人口预测中乡 - 城人口转移技术处理及人口转移预测[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 3 ) .
- [8] 尹文耀,姚引妹,李芬. 统筹城乡的动态人口预测与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2004 ( 6 ) .

### An Analysis of the Chang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the Implication

LV Li-dan<sup>1</sup>, DUAN Cheng-rong<sup>1</sup>, LIU Tao<sup>2,3</sup>, JIN Yong-ai<sup>1</sup>

1.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Beijing, 100872;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3. Center for Urban Future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nge and the deep reform of Hukou registration system in China,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academic value to interpret the change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recent years to predi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balance formula, this paper decomposes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chang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size and constructs a dynamic model of changing size of floating populations by considering the Hukou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an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recent structural change.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Hukou Registration Reform; New-generation Floating Population; Urban-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